

# 张学良东北易帜原因新探

—— 基于张学良口述史料的研究

解红丽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亲掌东北权柄后作出的一项重大抉择。张学良本人的口述史料清晰地再现其东北易帜时的心理活动，从崭新的角度揭示了其东北易帜的原因：顺应民族自救、国家统一的时代主流；能力远不及父亲，应付不了当时复杂的局面，主要是应付不了日本人的纠缠；渴望祖国统一，从无思求地盘之心；日本炸死父亲，国仇家恨加重了易帜的决心。

**关键词：**张学良；东北易帜；口述史料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2)02-0082-0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2.021.01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http://xuebao.wzu.edu.cn) 获得

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向世界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历史影响巨大。

目前学术界对于东北易帜原因的研究，大多依据事变的电文、报纸和档案，主要从张学良面临的来自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的双重外部压力、东北当时复杂的内部环境以及他本人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等方面进行阐述。但作为事件主导者的张学良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决定易帜的？他当时的心理过程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庆幸的是，张学良将军曾经多次接受学者采访，留下了丰富、详实的口述史料，这些口述史料为其亲见、亲闻、亲历和亲感，清晰地再现了张学良东北易帜时的心理活动，从崭新的角度揭示了张学良选择易帜的原因。

## 一、难逆历史潮流：“我不能和日本合作”

1991年12月21日，张之丙和张之宇采访张学良，谈到东北易帜问题时，张学良说到<sup>①50-51</sup>：

我认为，日本人把事情看得很狭窄，还有一样，日本完全把中国判断错误了。我跟日本人说：“你们完全把中国那个时代的人，看得好像是倒退五十年、一百年那时候，好像吓唬前清时那些人。”中国人那时候都差不多觉醒了，我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没弄清楚，这是我的看法。它没弄清，所以决策都错了。

它（日本）还是拿那旧的，过去中国人的思想，那时候的行为，搞利诱，给你点好处哇，我帮你一下啊，所以他一直都还想满洲国啊，这种思想，结果他还是失败。当我

收稿日期：2010-04-13

作者简介：解红丽(1984-)，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

① 张之丙，张之宇. 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C].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下文凡出自该书的文献都以①xx标出(xx代表页码).

的傀儡啊，做汉奸，中国那时候，换句话说，实实在在的说，你想做汉奸，你做不成，中国老百姓不拥护你，你还能做什么？……

上述口述材料中，张学良指责日本人看不清形势，然而张学良本人对国内形势洞若观火。民族自救、国家统一已成为时代主流，张学良是否接受国民政府的招抚，已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焦点，这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任何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会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张学良选择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是必然的。

清朝覆灭后，经过长期的军阀分裂和混战，向往统一已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和各个政治流派的共同愿望。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自日俄战争起，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最终使得仇日情绪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内容披露后，举国震动，国人无不觉得中国将蹈朝鲜的覆辙，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大规模的号召抵制日货的集会不断掀起，人们还把“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反日活动不论从地缘分布的广度，还是从参加人数、包含的社会阶层看，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宣称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移交给日本。这一无理要求激起全体国人的一致反对，并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1928年5月3日，日本为阻止国民军北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血腥屠杀中国军民六千多人。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使国人认识到“放弃内争、一致对外”已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

可见，随日本侵略行径愈发加剧，中国人的仇日情绪也日益激增。余英时曾说：“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sup>[1]</sup>作为北洋军阀仅存的一股军事力量，面对兵临城下的北伐运动和要求“全国统一、一致抗日”的呼声，张学良何去何从已经非常明显。

张学良曾说<sup>[2]59</sup>：

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这种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还能与日本合作呢？换句话说，我父亲与日本人合作被杀了，如果我还和日本合作的话，那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可见，张学良已看清日本的侵略本性。伴随国人仇日情绪日益高涨，张学良权衡利弊后，心里明白：只有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才是自己最可靠的大后方，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

## 二、自我信心不足：“我没有我父亲的能耐，我应付不了日本”

东北易帜，起因于张作霖被炸。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张作霖非命于日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就没有半年之后的东北易帜。当时东北集团处境十分艰难，前有南方蒋、冯、阎、李联合军事势力的进攻，后有日本人威逼，东北已经失去了维持张作霖时代那种状态的外部条件。

张学良是个非常坦诚的人，从他的多次口述中，他都谈及他在能力上没有父亲张作霖老练，应付不了当时复杂的局面，主要是应付不了日本人的纠缠。为了摆脱与日本交往时的困境，他必须寻找一个实力雄厚的后盾与其一致对外，这也是他实行东北易帜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张学良被公推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成为东北政治、军事和社会集团的主帅。对于此职他一直以自己资历不够推让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时说<sup>[3]103-104</sup>：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

不适于军政大任。

他还列出不堪重任的理由<sup>[3]104-105</sup>：

毫无准备。我父亲在时，我素未存有政治野心，自念年岁尚轻，所以不愿与文人政客接近，亦未曾留意政治人才之储备，突负方面大任，对于人事问题，多感棘手。

外患内忧。外有日寇之压迫，内伏反侧之隐忧。自念受地方父老之付托，故旧之期许，不敢冒昧从事，忍辱负重，茹苦含辛。

经济困难。奉天库存，本有盈余，连年战争，军费浩大，致省库空虚，通货膨胀。迨至我父亲遇难，人心惶惶，钱轻毛荒，日以倍落。而军费开支，原为数省之担负，今皆归于奉天一省，收支相差，几乎一与十之比。

身体衰弱。我早在郑县驻军期间，曾患有胃病和失眠症，系由心绪不佳和水土不服的关系。正在战争期间，不但不能休养，因战况紧张，仍须应付困难的任务，不得不以鸦片刺激，因而养成不良的习惯。……

初掌一方，困难重重。这段坦诚叙说，虽有自谦成分，但也符合实情。

一是张作霖被炸，对东北集团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尤其是对张学良的打击更是甚于其他人，他对执掌东北大局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二是张学良的能力的确和张作霖有很大差距。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实践中日积月累磨练出来的。张作霖从1894年任毅军哨长到1912年任民国27师师长用了18年时间，由师长到1922年任东三省保安司令用了10年时间，从哨长到保安司令，用整整了28年。而张学良的起点就是旅长，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就靠他父亲的关系当上了少将旅长，22岁任梯队司令，24岁任军长，26岁任中将军团长，28岁任东三省保安司令。28岁的张学良仅8年时间就得到了他父亲花了28年才得到的位置，仕途旅程比他父亲缩短了3.5倍，能力自然随之缩水，没有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自然难以抗拒突然降临的压力。

三是张学良面对的政治变局比张作霖时代更加变幻莫测。以前张作霖面对的是北洋各派军阀，在北洋军阀中，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军阀可谓计高一筹、力强一等。可遇到国民党新式军队，奉系集团就没有优势可言了，战场上被打得一败涂地；政治上既不占理，又失民心；外交上和南京政府比起来也是过于老套、进退失据。而此时的日本，也不是以前的日本了，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增强得很快，其侵略野心的增长更是惊人，其胃口已大到难以满足的程度，力量强到即使杀死奉系集团首领，奉系集团也无可奈何的地步。

四是张学良此时领导的东北集团已失去了昔日的强悍。在战场上，被南军所败，士气低落；首领被炸，整个东北都笼罩在悲愤无奈的情绪之中；集团内部，暗潮涌动，杨宇霆等高层人物各怀心事；东北虽为富庶之区，但连年的战争已将库存掏空。地盘本为支撑军阀生存的命根子，张作霖战败出关，原本为东北集团提供资源保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北岸诸省均为南军所占，财政断流，军饷都难以为继，这样一个集团，实难维系与发展壮大。

还有，张学良身体病弱，时常晕倒，只能靠鸦片维持着身体，因此，他的身体精力也无力应对当时复杂的内外局势。

面对这样一个突然事变，面对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政治局面，面对这样强大难缠的对手，麾下又是濒临绝境、仅靠一点封建意识和死者余威勉强维持的政治集团，张学良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没有我父亲的能耐……我应付不了。”<sup>①1626</sup>事实上，有“能耐”的张作霖也正是因为应付不了而身死敌手！

### 三、渴求祖国统一：“我是中国人，我从未思求地盘之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客观环境迫使张学良做出了不得不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抉择，那么他当时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他是真心愿意归顺的吗？

#### （一）“我是中国人”

1991年12月17日，张学良对采访他的张之丙和张之宇坦诚地说<sup>①56-57</sup>：

东北的地位，我不跟中央合作，自己独立在那儿，我决不能，（因为我）没有能力受两方面的压迫。那么我（如果）跟中央合作，虽然那时中央没有（能力）完全帮（我），但我还是（可以）靠中国的力量，那么日本他来，要想着（他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东北。

这是一个中国，明白吗？我也是受中国旧教育，儒家教育的，所谓事齐乎？事楚乎？我当然得（想想），假如我自己能站得住，我可以；（但实际情况是）我自个儿站不住，……

日本田中首相担心张学良因其父被炸而转向反日，于是派遣外务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林权助前来劝说，阻止张学良采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对于当时自己的态度，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到：<sup>①52</sup>：

因为外头知道我要易帜，他也看出来我要这样做，所以他劝我不要，……我告诉他，你什么都替我想，就没想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不能那么做。

在张学良接受的历次采访中，每当被问起东北易帜这件事，他总会自豪地反复陈述自己是中国人，自己是爱国狂，他的价值观决定其不会背离祖国，不会因一己私利，做傀儡和卖国贼，他是受中国旧教育——儒家教育的。张学良虽出身于旧军阀家庭，但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他认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他青年时期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批外国朋友，深受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16岁时听取爱国者张伯苓的讲演，颇受震撼。1930年，他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讲演时说：“予幼时对国事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演讲，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努力救中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sup>[4]</sup>自此，张学良真正树立了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使他主观上愿意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 （二）“我从未思求地盘之心”：“所谓易帜，我的主要决定是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张学良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那时的中国，军阀派系林立、各据一方，为扩张一己地盘，长期混战不已。作为奉系的少帅，张学良受命于尊长，领导了数次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战争，但是，这恰恰使忧国忧民的张学良开始厌恶内战。特别是看到列强渔翁得利，中国生灵涂炭的情景，他从内心希望中国统一，结束内战，一致对外，而不计较个人统治地盘的得失。

张学良在自传体遗著中说：当我父亲遇难，我方廿八岁。我从未思求地盘之心<sup>[3]103</sup>。

在1993年他作口述历史时，也多次谈到军阀的地盘问题。他回忆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时，他曾力劝张作霖“息争”<sup>①54</sup>：

中国打内战，打了几天又好了，好了几天又打，什么意思？也不过是你要抢这地盘我要抢这地盘，各人争势力。中国大家要好好的、和和平平的，各人守各人的疆土，所以我劝我父亲退出关外，何必呢？

直奉战争时，张学良严令他的部将，不许为地盘而战<sup>①965</sup>：

我们当时一出发，歃血为盟，我这些将领啊，说我们出去打仗，谁也不许抢地盘，



谁也不许占地盘。

可见,张学良对抢地盘的军阀恨之入骨,自己怎么会固守一方,做个阻挠全国统一的军阀呢?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凭借东北资源丰富、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和手中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海陆空军队,以及奉军长期作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张学良确有与蒋介石一争高下的实力,但他却选择归顺,这就如他说<sup>①77</sup>:

“东北易帜的问题,跟人家,我根本就没说,我可以说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所谓易帜,我的主要决定是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 四、难忘杀父之仇:“你把我父亲炸死了,我怎么能跟你合作?”

中国自古就有“父仇不共戴天”的说法,日本炸死张学良的父亲,这加重了当时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决心。最早采访张学良的日本的NHK记者问及其加入国民政府,是否主要因为其父亲的被杀,张学良回答说:“这倒不是,不过这件事激使我,使我决心更大”<sup>①</sup>。

后来,在谈及父亲的意外死亡时,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学良情绪仍无法平静。他对NHK记者说<sup>①2158</sup>:

“我父亲特别喜欢我,我父亲死的那天这是我的生日,我相当迷信,我和我父亲之间确实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我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我的生日,一过生日就想我父亲(流泪)。我父亲对我很好,很喜欢我。我父亲一死,我非常难过。”

可见,张学良同父亲的感情是非常好的,慈父的意外被炸死,对张学良内心影响巨大。因为父亲的死,他可以连生日都不要,看到仇人,他想立刻杀之,足见其心里的悲痛,张学良确是性情中人,对父亲的感情使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那当然我对日本是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也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家仇国难,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杀我父亲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sup>①2157</sup>

“你把我父亲炸死了,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合作?……”<sup>①50</sup>

#### 五、结 语

本文在张学良口述史料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再现了易帜前张学良的心理活动状况,探索了影响其选择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心理因素。当时,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要求国家统一、结束内争。民心所指,是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都不能违背的,这给张学良巨大的心理压力。加上东北地区面临复杂的内忧外扰,受多方势力牵制,固守一隅不得。同时,自己历练不足,无法妥善应付,所以需要能最大可能维护本地区利益的坚实后盾。最为重要的是张学良一直秉承自己是中国人的理念。所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是张学良的主观意愿,这点从他的口述史料判断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主要依据张学良的口述史料。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史学家的质疑,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学者多搜求文字和实物资料,并以此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对其他类型的史料则不予足够信任。事实上,正如18世纪英国学者撒谬尔·约翰逊说:“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sup>②</sup>历史的参与者以口述方式来回忆往事,这更能使历史学者由此发现当时的社会变迁及个人生活变化,来从历史事件当事人内心思想活动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历史事件。口述史料具

① 毕万闻. 英雄本色: 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82.

② 唐纳德·里奇. 大家来做口述史[M]. 王芝芝, 姚力, 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3.

有其他史料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这是不容否认的。

具体到本文来说，当我们知悉张学良参加口述采访的原因时，是不是更加坚信其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呢？

张之宇记录下了晚年张学良的心声<sup>[5]</sup>：

“自度已近花甲之年，岁月无多，兹先就数宗关于我自身的，目下我能想起来的、认为比较重大者，分别记下……以供史学家之参考，或者有戒于后人……我力求避免上述不实、讳隐、夸张之弊，而存其真。”

####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203.
- [2] 白井胜美. 张学良开口说话: 日本 NHK 记者专访录[M]. 管宁, 张友坤, 译注.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 [3] 张学良. 杂忆随感漫录: 张学良自传体遗著[M]. 张之宇, 校注. 台北: 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 [4] 张学良. 在南开大学之演讲[N]. 天津. 大公报. 1930-12-11(2).
- [5] 张之宇. 张学良探微: 晚年纪事[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12-13.

## New Exploration of Reasons for Changing Banner of Northeast China by Zhang Xueliang

—— Based on Zhang Xueliang'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XIE Hong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e Banner Changing of Northeast China was Zhang Xueliang's major decision after his controlling of the Northeast China authorities. Zhang Xueliang's ment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Banner Changing of Northeast China could be vividly reproduced with hi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a new angle, reasons for the banner changing could be concluded as: firstly, Zhang Xueliang's conformation to the times mainstream of national self-help and unification of China; secondly, his 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he was much less able than his father to cope with the complex situ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mainly felt boring of Japanese's obsession of conquering Northeast China at that time); thirdly, his firm eagerness for re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weak demand for conquering lands himself; and lastly, Japan killed his father, his hate for country being aggressed and father being bombed dead by Japanese, which strengthened Zhang Xueliang's determination to change the banner.

**Key words:** Zhang Xueliang; Banner Changing of Northeast China;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

(编辑: 朱青海)